

---

# 评《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

童志强

---

近十多年来,皖南事变研究一直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1987年南京军区作家黎汝清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的发表出版,更是引发和推动了史学界、文学界和新四军老战士的研究热情。笔者在《皖南事变研究十年》一文中称此现象为“文学对史学的挑战”。为什么作如是说?因为我觉得对皖南事变这样的重要历史事件,尽管史料汇编和研究文章出了不少,但史学界的研究专著尚不多见。仅有的一本198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皖南事变本末》,基本上属于资料长编性质,由于当时大量的档案文电还没有公布,所以该书作者对一些史料的介绍和考证以及对有关问题的论述明显有力不从心之感。

中国档案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一书,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李良志教授多年笔耕的成果,也是近年来皖南事变研究的一部力作。披览全书,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 一、谋篇布局,颇具匠心。

从1937年底新四军诞生到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整整三个年头。这三年中,新四军从谈判、建军到集结、东进、北上,经无数次对敌作战,部队从初创时的1万人发展到近9万人。其间,陈毅、张鼎丞、粟裕率第一、二支队东进苏南,北渡长江;谭震林率第三支队雄踞皖南;高敬亭率第四支队挺进皖中;罗炳辉率第五支队威震皖东;彭雪枫率第六支队转战豫皖苏边;李先念率豫鄂支队崛起于大别山西侧;刘少奇率中原局抵华中奠定苏北抗战局面;周恩来视

察皖南军部；叶挺受项英排挤两度出走；高敬亭被错杀案……这一段历史，跌宕起伏，异采纷呈，无不可以让史学家的笔触纵横圈点。刚看到该书书名时，自忖涉猎过新四军历史的笔者，曾有过一丝担心：如果仅仅是就皖变写皖变而不将有关背景交待清楚，那么距事变半个多世纪的读者难免会有不少困惑费解之处；如果追溯新四军发展的历史线索，详细交待事变发生的前因后果，皖变这个主题则可能会被淹没在大量的史料之中。然而读完全书之后，才知道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全书围绕新四军问题以国共两党关系变化为主线，在新四军众多人物中突出叶挺和项英这两个主要人物，紧紧扣住了主题。作者以三分之一篇幅交待新四军的成立、挺进大江南北以及华中国共关系的逆转过程，然后将重心放在皖变的全过程，浓墨重彩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和新四军奋起突围的悲壮历程，最后交待皖变之善后和叶挺、项英的结局。综观全书，主题突出，脉络清晰，取材精当，要而不繁，体现出作者驾驭史料的深厚功力。

## 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对项英在主持新四军时期的功过问题，一直是皖变研究热点中的热点。“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路线下，曾全盘否定项英的一生，甚至抓住他在皖变中一度中途离队的错误无限夸大、上纲，打成叛徒。前几年则出现另一种极端，即全盘肯定项英的观点，为尊者讳，认为他不仅是新四军东进北上发展方针的制定者之一，而且还是忠实的拥护者和积极的实践者，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是针锋相对而不是一味迁就退让的。换言之，即当时中共中央对项英的许多批评不实事求是，应该重新作出决议。李良志经过对史学界各种观点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如此惨痛损失，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后者还是主要的。客观原因是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八倍于我，力量对比太悬殊；主观原因，主要是项英的右倾错误。”他认为：项英对在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严重意义认识不够,对新四军的战略方针认识不够,对国民党必然要摧残新四军的紧迫性丧失警惕,因而在北移问题上一再迟疑,丧失了宝贵的时机,最后终于陷入极为不利的处境,步入顽军的重围,“这是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所属 9000 余人惨遭围歼的主要原因”。

根据对叶挺、项英关系的分析,他认为:新四军两位主要负责人项英、叶挺的关系不和谐,也是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严重挫折的原因之一。由于项英对叶挺的偏见,“以致在皖南事变的生死攸关时刻,叶挺的正确突围意见也未被接受。在突围战斗最激烈紧张之际,军部四位决策人物项、叶、袁、周,不是形影不离在一起共谋对策,常常是叶挺独自一处,冷冷落落,无所作为;1月8日,项、袁、周竟不同叶挺作任何商量,不辞而别,只身逃遁寻求生路。项、叶之间的这种不正常关系,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对新四军的发展是潜在的危机,最终导致皖南事变中领导集团松散、分裂,甚至激战中一时群龙无首。事变中我军的惨重损失,与新四军军部领导人之间不和谐、不团结及其发展,是密切联系着的”。作者在指出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有一系列错误,在许多问题上完全与中央对立”的同时,对他的错误产生的原因也作了中肯的分析,认为:“中共中央对何、白《皓电》后的时局的估计失误,确也影响了项英对皖南危局的认识,影响了他尽速北移的决心,致皖南新四军开动之时,已是势若危卵矣!”上述对项英错误的分析,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科学评判。

作者对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对策的制定经过之分析也令人信服。

数天之内损兵折将 9000 余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共所遭受的最大损失,其对中共高层领导之震惊可想而知。事变发生后,如何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成为摆在中共高层领导面前的头等大事。如何认识事变和估计事变发展的前途,乃是决定党的反击斗争策略的关键。作者引用了大量文献,向读者介绍了中共中

央在确定对策时经历了从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大反攻,到政治反攻、军事上准备反攻,到政治攻势、军事守势,到坚持又斗争又联合,通过斗争维护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重大变化、转折。从作者引用的史料中,他并不讳言“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对局势的分析,确实存在不少脱离实际的估计和分析,其对蒋的斗争策略中,确实包含着不少有损国共合作和抗日大局的危险步骤”。在指出这种失误的同时,作者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共中央实现这个变化和转折,“当然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十分艰难的。中共中央在事变的最初日子里,准备实行军事、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政策,这在感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对局势的走向一时难以预料、把握,宁肯把事变前途的困难估计得更多一点更坏一点,这对当时党的斗争也是有好处的,只有无知者才会去要求党的领导人任何时候都是一贯正确的圣人”。“中共中央的高明之处,不在于一开始就能对事物发展、变化神机妙算,能预卜一切;而在于始终谨慎行事,重视调查研究,对许多有碍大局的危险措施,未予立即执行。当中央一旦明白了时局的本质,认清时局变化的真正动向,就毫不犹豫地纠正其错误之处,从而使党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唯其如此,当读者看到中共中央由于采纳了党内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各种意见,最终确定了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抗日的正确决策时,才会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领导运筹帷幄、力挽狂澜、驾驭复杂局势的雄才大略和善于集中党内智慧的民主作风产生更深刻的认识,才会体会到经过20年锤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日趋成熟。

### 三、高屋建瓴,鸟瞰历史。

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这场“内战”,距今已半个多世纪。作者现在推出这本专著,其意义决非仅仅是澄清史实,复原历史。诚如作者所言:“今天写此书,并不是偏爱旧事重提,更不是要对谁算老账;而是为了在学术上继续争鸣,阐述对皖南事变有关争论问题的一孔之见,在政治上则是要阐述历史经验教训,以推动新时期已蓬勃开展的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展望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在新条件下

的民族凝聚和民族振兴,使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早日完成。”

皖南事变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领域,它与中国抗日战争史乃至整个国共关系史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该书在分清是非曲直的同时,对事变后国共两党经激烈斗争后相互作出妥协,仍归旧好,共同抗日,也作了叙述,以证明伟大的民族抗战没有因皖南事变而夭折,这是国共两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相互作出的明智和冷静选择的的结果,以及没有国共合作,便不会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真理。作者站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高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来鸟瞰历史,揭示出中国抗日战争中期这一历史横断面,真切地凸现出国共两党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运动轨迹。这充分表明作者身为历史学家所怀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当然,该书也还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如发生在苏北黄桥战役之后不久的曹甸战役,距皖南事变发生仅 20 天,两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作者大约是囿于史料不足的缘故,居然只字没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1940 年 11 月 29 日晚,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出动 10 个团兵力,分三路发起曹甸战役,意在“歼灭省韩主力”、“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结果由于曹甸深沟高垒,易守难攻,以及新四军、八路军首次配后作战不够协调等原因,终未得手,最后于 12 月 16 日撤出战斗。曹甸一战攻而不下,暴露了华指实力不足,使蒋介石、顾祝同认为韩德勤在苏北仍有余勇可贾,因而在皖南发动事变无须投鼠忌器。此前,在黄桥战役结束后,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于 11 月 14 日拟定上报《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准备伺机在南方报复。对此作战计划,蒋介石原已批示等到 12 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当 12 月 10 日曹甸战役正在激战之时,蒋介石即接受了军令部长徐永昌“先行下达命令”的献策,向上饶的顾祝同正式发出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命令。相反,高敬亭错案系与该书主题无关的枝节,倒是可以删却的。

此外,该书引用的文电绝大部分是第二手转引的档案资料,个别文电的时间原本有错,在转引时似应经过重新考订为妥。如第

141 页倒数第 7 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示叶挺等：“皖南部队及军部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书中认为此电时间是 1940 年 9 月 22 日，出处转引自《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 62 页。实际上此电的正确日期应是 11 月 22 日。电报中“动手解决韩德勤”指的是曹甸战役而不是黄桥战役。毛泽东已看到华指如在曹甸动手，皖南新四军的处境会更加危险，于是在曹甸战役发起前一星期向军部提出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

再如，第 144 页第 6 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向叶挺、项英发出紧急指示：“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与资材势必被打散。”书中转引此电载于《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 116 页。实际上此电的正确日期应是 11 月 24 日。当延安获悉华指决定于 11 月 25 日准备完毕即发起曹甸战役时，在 11 月 24 日一天之内连发两电给叶挺、项英。前电内容是要皖南新四军在 20 天内处理完一切问题，在 12 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叶挺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当天下午申时(15 时至 17 时之间)，又紧接着补发一电：“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与资材势必被打散。”发出这两电的原因都与曹甸战役有关。原电系毛泽东亲笔，签署 22 日和 24 日，但没署年、月。《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编者在收入书中时考证有误，特此补正。

再如，书中所有人物均直呼其名，独对蒋介石称委员长，亦无此必要。还有，文中对新四军的称谓，有时用部队番号，有时则称“我军”，宜统一用部队番号。

以上意见供作者再版时参考。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